

再論馬禮遜《華英·英華字典》傳入日本的一些問題

陳力衛 CHEN Liwei

拓殖大學

有關馬禮遜字典在日本的傳聞，最先來自《馬禮遜回憶錄》（1839）中的記載，亦即馬禮遜與來自日本長崎的荷蘭商館員伯格爾的會面，但我們追蹤後者的蹤跡發現，不是《馬禮遜回憶錄》中說的 1828 年 11 月，應該是在 1 月份。其次，該信中所描述的馬禮遜字典在日本深受歡迎的情形，明顯有伯格爾誇大其詞的一面，實際上在 1828 年之前被日本人翻譯的不是馬禮遜字典，而是那本被施福多 1823 年帶到日本的馬禮遜的《英國文語凡例傳》中的語詞表，加上荷蘭語對譯，制成一份英蘭華對譯詞表。該書譯者，正是《馬禮遜回憶錄》中提到的 Gonoski Kokizas，即正式名字為吉雄權之助。根據馬禮遜 1828 年 1 月寫給其子的信，我們判斷上述回憶錄中的拼寫有誤，正確的拼法應該是 Gonoske Rokizero，即權之助六二郎。

首部馬禮遜字典傳入日本的時間應該是伯格爾受馬禮遜委托親自帶給權之助的那套，也就是伯格爾 1 月在廣州與馬禮遜見面後，4 月啟程返回巴達維亞，然後在 1828 年 8 月 6 日帶到長崎的。而且，所謂一套不是指現在的三部六卷，而應該是第一部的字典三卷和第三部的英華字典一卷（共四冊）。因為大槻磐溪 1829 年 4 月在權之助家居然沒有見到《五車韻府》，而且幕府官方的翻譯機構蕃書調所所藏的一套也不包含之，說明按英文字母排序的《五車韻府》主要是為西洋人學習漢語編排的。

在梳理這些問題後，我們再看 1828 年以後權之助是如何翻譯馬禮遜英華字典以制成荷英華三國對譯辭典的，這等於是《英國文語凡例傳》的擴大版。該辭典通過各種抄本在日本流傳，不僅對日本的蘭學的發展影響甚大，而且對其後的三國語辭典的編輯，形成一種模式。直至明治初期中村敬字校訂的、以羅存德《英華字典》為底本翻刻的《英華和譯字典》（1876 年）都是這一實踐的產物。

我們確認了在巴達維亞的麥都思意欲向日本輸送馬禮遜字典的可能性，也就是通過巴達維亞渠道，馬禮遜的辭典得以進入日本。1831 年權之助死後，他翻譯編輯的三國語對譯辭典的原本最終還是落入伯格爾手中，不知道他是否踐行了要為馬禮遜訂購該辭典的承諾，但另一方面他又找人謄寫了一份寄給返回歐洲的施福多，為其策劃的蘭和中三國語辭典做參考，亦即作為增添漢語譯詞部分的一個依據。也就是說，馬禮遜的英華字典的中文譯詞以這種方式不僅滲透在日本的蘭和辭典中，還遠傳歐洲，反映在的施福多編輯的蘭和中三國語辭典中。